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 我所亲历的 延安整风

下  
册

任文 主编

北京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 我所亲历的 延安整风

下册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001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下） 胡乔木
- 034 在整风运动中 余秋里
- 038 参加延安整风 张宗逊
- 042 1942年整风片断 白炳书
- 054 一个普通党员的延安整风回忆 刘毅生
- 061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 刘鸿志
- 065 参加整风和审干 陈明
- 071 平地风雷 刘白羽
- 082 我在延安经历的审查干部运动 黎辛
- 092 在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审干运动 陈学昭
- 098 整风运动在清凉山 温济泽
- 105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延安 口述：庄启东 整理：黄仁柯
- 113 延安整风令我终生难忘 慕丰韵
- 117 整风运动在抗大三分校 李逸民
- 123 抗大整风 徐向前
- 131 民族学院的精神洗礼 王仲方
- 137 忆自然科学学院发展的一些情况 林伟
- 146 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王珺

##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下）

胡乔木

### 1943年春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

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春天调整了领导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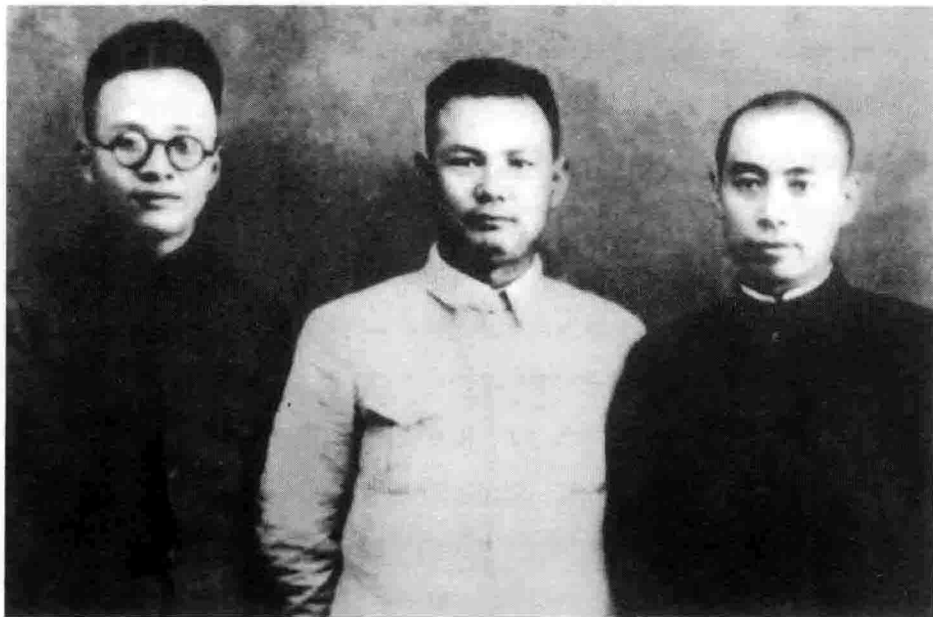
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尽管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成员的地位和责任也有较大变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其成员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做调整。这样，直到开展整风运动，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凯丰；书记处书记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公认，并且也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和国际舆论所确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闻天同志有事都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闻天同志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主席拿主意，做决定。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

央书记处继续工作。闻天同志深感工作很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从1942年初起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同志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自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恩来同志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主席做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即由任弼时同志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弼时同志自1940年3月下旬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就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弼时等同志回国，主要是准

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恩来、  
叶剑英、博古（右起）



备召开“七大”。1940年5、6月间，中央决定弼时同志担任“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以后发生皖南事变，“七大”就被拖下来了。这以后，在政治局内，弼时同志分工主管党群口和情报工作，并协助毛主席做些事情。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弼时同志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42年初，闻天同志到基层做长期调查，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完全由弼时同志负责了。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由弼时同志做中央机构调整方案的报告，就在情理之中。弼时同志报告说：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和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前一时期多为书记处工作会议，实际上等于各部委联席会议，与政治局会议无多大区别。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主席、少奇、弼时、朱德、洛甫、康生、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尚昆、彭真、高岗、剑英，共13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还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会议还决定少奇同志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

凯丰四人组成，泽东同志任书记，稼祥同志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可以列席某些有关的政治局会议），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尚昆、弼时八人组成，由少奇同志任书记，尚昆同志兼任秘书，也是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由于毛主席要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宣传委员会实际上由稼祥同志具体负责，胡乔木协助稼祥同志做些具体工作。

这次中央机构最显著的变动，是少奇同志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与毛主席一起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变动是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逻辑结果。前面已经介绍过，在那次会议上，陈云等领导同志认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主席在那次会上虽然没做什么表示，但实际上肯定了这个意见。他在会后写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处援引少奇同志的观点，赞赏少奇同志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少奇同志的责难。主席在“第八评”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在我所接触到的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做这样高的评价是很少的。这足见主席对少奇同志是多么倚重。

少奇同志自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就去了华中，领导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其间，在1939年3月到10月回延安半年，他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这以后又去了华中，发展新四军和开辟根据地，工作都成绩卓著，与项英领导的皖南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两种局面。在皖南事变后，被委任为新四军政委，负起了领导整个新四军和华中地区工作的全责。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即10月3日，

毛主席电告少奇，中央决定少奇同志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10月11日，毛主席又去电询问，望少奇同志在两三个月后来延安，并在延安指挥华中工作。1942年2月，刘少奇准备动身启程，毛主席又去电，要他路过山东时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人之间的争论问题。为保证少奇同志回延沿途安全，中央还专门派员调查了解由华中到华北的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毛主席还多次去电嘱咐少奇，必待路上有安全保障，方能启程。当少奇同志在1942年5月到达山东后，毛主席又致电于他，委任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因通过封锁线安全尚无保障，不必急于西进。在少奇同志处理完山东问题，于1942年10月到达晋北地区以后，主席又电告该根据地领导人，指示他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12月下旬，少奇同志安抵一二九师领导机关驻地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的赤岸村，毛主席去电表示慰问，望其休息短期后来延，并让他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二位，对少奇同志来延路上的安全保障做周密布置。1942年12月30日，少奇同志平安抵达延安。毛主席这才好像一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了。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晚会并欢迎少奇同志从华中归来的消息。少奇同志在路上走了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主席无时不在挂念。对少奇同志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见亲闻中也是很少有的。大家深为党的领袖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所感动。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

## 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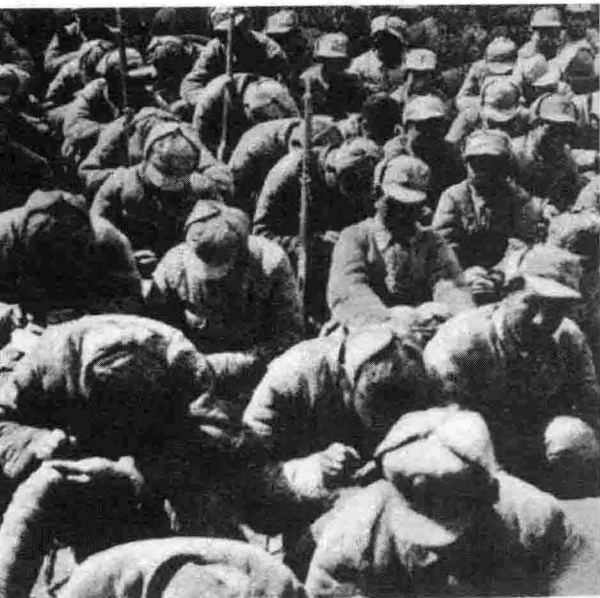
还在中央领导机构调整之前，中央政治局已初步决定，延安的整风运动逐步地结束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在3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一边工作，一边审干。（毛主席在11月13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的机关、学

校，事实上从1942年冬季已开始审查干部。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整风运动正式转入第二阶段。

延安审干从1942年冬季开展后，毛主席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少奇同志任主任。7月1日，毛主席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日，毛主席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的方针就是逼供信三字。”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到会发表讲话。这是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毛主席第二次到中央党校讲话（第一次是做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也是中央党校在1942年2月底改组和调整领导班子由毛主席亲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后，第一次到党校讲话。毛主席强调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是党校六门课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军事班的军事课、文化班的文化课），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

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主席设想的那样顺利开展。负责审



延安整风学习

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

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毛主席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不断地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就指示让它停下来。8月15日，党中央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了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审干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三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

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10月9日，毛主席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11月5日，毛主席在致小平同志电中还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许捉5个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于12月22日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会议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开展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好的方面看：（一）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二）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三）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四）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五）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从阴暗方面看：（一）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二）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三）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四）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五）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下降。会议分析产生上述偏向的原因主要是：对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估计不足，或估计过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掌握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还有一个原因是，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有某些部门，领导权操在不可靠分子手上。会议决定，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的分子分为下列

六类：第一类，特务分子——包括职业特务与非职业特务，系指加入特务组织，或与特务组织有联系，或有特务行为者。第二类，变节分子——自动自首写反动文件或被捕自首写反动文件者；叛徒即自首叛变供出组织或出卖同志者；被特务发展并接受任务，未向或曾向党报告者。第三类，党派分子——加入国民党、CC系、复兴社、三青团等党派，入党时未向党报告者；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加入进去后未向党报告者。第四类，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在“红旗政策”下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在党内犯错误（半条心的）做了特务之义务情报员者。第五类，党内犯错误的分子——自由主义小广播，泄露秘密者；假造党龄，隐瞒历史者；心怀不满者等。第六类，完全弄错的分子——有因背景复杂被指为特务者，有被特务分子或坏人诬指为特务者。

在会议讨论中，弼时同志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做了发言。他说：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因此，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弼时同志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毛主席也在会上讲了话，同意会议的分析，要教育干部用这种方法去研究问题，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主席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将坦白

分子大致分为六类，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1943年底至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尽管过去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清出的“特务”甚至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就有208人），但由于坚持不杀一人，不断进行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而且，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仅我知道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 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

在普通干部的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进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1941年“九月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国际”去告状，这就使认识的分歧加剧了。1942年底少奇同志回到延安，1943年3月闻天同志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当时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七大”，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比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共19人。

这次政治局会议与两年前的政治局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的区别。1941年的时候，虽经历了皖南事变，但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特别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都对欧洲战争形势的发展甚为关注，到1941年秋，

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这为政治局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环境，使大多数与会者认识问题有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减少了外在因素的干扰。这次政治局会议则是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政治局会议在9月召开之时，尽管已粉碎了国民党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但强调对其开展坚决斗争的这一侧重点没有改变。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

就对王明路线的批评来说，事实上早在7月中旬就已开始了。例如，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说：要“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在7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



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中国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屡次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予以坚决反抗，都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实际的教训。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对党外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仍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过去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都能团结一起工作。在8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批评王明1941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强调蒋介石集古今中外反革命的大成，是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我党的反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还可进行四个月，直到国民党向我有所表示时方可停下来。毛主席的这些认识，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来说是正确的，就对王明

1939年，陈云、吴玉章、  
邓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左  
起）在延安

